

关联理论：反思与发展

孟建钢 曾建松 编著



关联理论：反思与发展

孟建钢 曾建松 编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哈尔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联理论：反思与发展 / 孟建钢，曾建松编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686-0334-8

I . ①关… II . ①孟… ②曾… III . ①逻辑学—理论
IV . ①B8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4362 号

关联理论：反思与发展
GUANLIANLILUN: FANSI YU FAZHAN
孟建钢 曾建松 编著

责任编辑 杨琳琳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三道街 36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93 千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86-0334-8
定 价 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关联”之路

1986 年由 Dan Sperber 和 Deirdre Wilson 创立的关联理论最早是由沈家煊(1988)和张亚非(1992)引入我国外语界,之后曲卫国(1993)、何自然(1995,1998,1999,2004)、熊学亮(1996,1997,2000,2005)、何兆熊(1997)、刘绍忠(1997,1998)、冉永平(1997,2000,2001,2002a,2002b,2004,2005,2006)、刘家荣(1997)、周建安(1997)、苗兴伟(1997,1999)、蒋严(1998,2002,2008a,2008b)、赵彦春(1999,2002,2003)、陈新仁(2001,2003,2004,2005)、徐盛桓(2002,2005)、姜望琪(2002)、莫爱屏(2003,2004a,2004b,2004c,2011)、孟建钢(2002,2004,2008,2012,2015,2018)等学者,在关联理论的引介、推广和应用上做出了较大贡献,也影响了很多语用学学人,典型代表如胡旭辉(2007,2008,2014)、曾建松(2015,2017a,2017b)等。应该说,主要因以何自然等前辈为首的学者所做出的共同努力,20 世纪 90 年代下半段至 2010 年前后,关联理论研究在中国语言学界开展得如火如荼。一个被引进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在中国语言学界产生了如此大的轰动效应,这种现象甚为罕见。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语言学界关联理论的研究热度仅次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研究,一是研究广度和深度较大,二是研究持续时间相对较长。

关联理论研究在国内持续 20 年红火的原因不是偶然的,关联理论的确是一个好的语用学理论。语用学作为一个学科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被建立之初,其支撑性理论是格莱斯会话含意理论(后被称为“古典格莱斯理论”),

但国内外学界都意识到该理论有很大的缺陷,如没有涉及推理机制的研究、对“关联性”问题避而不谈、对语境的假设不合逻辑等。这些问题都是语用学的关键问题,对此关联理论均做出了合理的研究和诠释。也正因为如此,关联理论问世后,就立即取代了格莱斯会话含意理论,成为当今认知语用学的基础性理论(何自然,冉永平,1998)。语用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迅猛,为此关联理论居功至伟。在关联理论问世之前,语用学因为其支撑性理论——“古典格莱斯理论”有重大缺陷,一直有个不雅的绰号“垃圾篓”。对此,国内外许多语用学学人都在针对“古典格莱斯理论”的缺陷做些修正工作,其研究成果被英国密德萨斯(Middlesex)大学高级讲师 Billy Clark(2013)归类为“新格莱斯理论”,但“新格莱斯理论”总体上只是对“古典格莱斯理论”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并未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其重大缺陷问题。在这些“新格莱斯理论”中关联理论脱颖而出,彻底解决了“古典格莱斯理论”的缺陷问题,也因此被 Clark(2013)称为“后格莱斯理论”,以示跟“新格莱斯理论”相区别,因此关联理论作为唯一的“后格莱斯理论”是一种跟“古典格莱斯理论”有着本质区别的语用学理论。

但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将关联理论视为是“新格莱斯理论”中的一种,这是不妥的。虽然 Dan Sperber 和 Deirdre Wilson 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以下简称《关联性》)一书的前言中说,他们写此书的初衷就是针对“古典格莱斯理论”中的几个问题研究研究、写几篇论文,但“不小心”将几篇论文写成了一本论著。这话明显是出自谦虚,在该书第一章中(2001),Dan Sperber 和 Deirdre Wilson 就婉转地提出,应该有一种可以说明人类交际的一般性理论,也即关联理论从一开始就被设计为能够说明人类交际的一般性理论,而且在这一章中他们在正式介绍关联理论之前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否定语码模式,二是否定了格莱斯会话含意理论。可见他们为创建关联理论做了非常充分的铺垫工作,同时也可看出从一开始他们就根本没有打算只对格莱斯会话含意理论做些修补性的工作,也即从一开始他们就要创建一种全新的、能够说明人类交际的一般性理论。但为什么 Clark(2013)将关联理论称为“后格莱斯理论”呢?毕竟关联理论是针对“古典格莱斯理论”中的重大缺陷来设计的,旨在创建一个全新的语用学理论:如关联理论解决了人类大脑推

理机制问题,充分论证人类大脑推理是演绎性推理;充分论证了“关联性”问题,在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中关联性问题只是一带而过,但关联性实则是说明人类交际的关键性问题;充分论证了人类交际中的语境问题,首次提出了动态语境观,由此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静态语境;彻底改变了之前的语用学研究对象、方法和路径,“古典格莱斯理论”重点研究的是说话人,而关联理论则正好相反,研究重点是话语理解。对此,熊学亮(1996)认为在交际中研究受话人比研究发话人要保险和稳妥得多,就好比在踢足球时研究接球者比研究踢球者要方便得多。

关联理论相比语码模式和“古典格莱斯理论”更加全面,如语码模式只研究话语的字面意思,而“古典格莱斯理论”则越过明说(explicature)而直接研究所谓的意图推理,因此这两者无论哪一个都不能单独成为一个有效说明人类交际的一般性理论。而关联理论则有效地将语码模式和意图推理“二合一”,实际上,从一开始写《关联性》这本书时,Sperber 和 Wilson 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可以充分说明人类交际的一般性理论。因此,自 1986 年关联理论问世后,就立即在国内外语言学界引起了一个大轰动,之所以能立即取代“古典格莱斯理论”而成为语用学的支撑性理论,是因为该理论有效地弥补了语码模式和“古典格莱斯理论”的所有重大缺陷。迄今为止,关联理论在语用学界的地位仍然未变,一直是语用学的支撑性理论,虽然对该理论的争议声不断,但还未出现替代关联理论的新理论。

如前所指,关联理论问世后的研究热度有两个特点,一是国内外都热,二是持续时间长。就国际研究而言,“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CL) 20 多年前专设的“关联网页”(Relevance List)至今还很活跃,西班牙人 Francisco Yus 创建的“关联在线”(Relevance Online)网站至今也还在不断添加发表在国内外重要专业学术刊物上的代表性论文。国外的关联理论研究热度一直持续到现在,甚至包括创始人 Sperber 和 Wilson 时至今日还在研究、总结和完善关联理论,如 2012 年出版了论文集《意义与关联》(*Meaning and Relevance*),共收录 15 篇论文,其中 10 篇是 Wilson 和 Sperber 所作,其余 5 篇是他们与其他学者合作而成。文章有 3 篇是 1995 年之前发表的,其余 12 篇都是从 1995 年至今的作品(朱海婷,林允清,2014: 625)。2013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了英国密德萨斯大学 Billy Clark 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一书,该书主要是对关联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诠释。这个工作还是很有必要的,虽然关联理论问世已经很长时间了,但该理论的确很难理解透彻而导致许多误解和争议,笔者在下文中会专门谈论这个问题。关联理论理解之难,就连该理论创始者之一的 Deirdre Wilson 自己都承认。记得 2003 年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的第一届中国语用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就关联理论几个问题向 Wilson 请教,Wilson 回答说关联理论中的有些问题她自己也无法理解。当时由于围着 Wilson 交流的人较多,笔者也不方便进一步详细问是哪些问题,但关联理论难理解是肯定的。

虽然最早将关联理论引介到国内的是沈家煊(1988)和张亚非(1992),但真正促使关联理论在国内得以大面积推广和应用的人是何自然和他的一些博士生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参见第一段)。笔者认为在众多引介关联理论的论文中有两篇标志性论文,第一篇是何自然和冉永平发表在《现代外语》1998 年第 3 期的论文“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这篇论文直接点燃了国内广大学者和研究生学习和研究关联理论的热情。该文全面、深入地介绍和评述了关联理论,在国内引起了广泛、高度关注,被引频次高达 1311,为在国内推广关联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对于研究关联理论的人来说,这篇论文成了必读文献,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另一篇经典论文就是赵彦春发表在《现代外语》1999 年第 3 期的《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一文。众所周知,Wilson 的博士生 Gutt 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创立了关联翻译理论,但真正让广大中国读者熟知且运用关联翻译理论的却是赵彦春的这篇论文。可以说这样说,凡是国内从关联视角研究翻译的人都必须学习《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一文,该文被引频次高达 1431。随着这篇经典论文的发表,国内翻译界掀起了一股关联翻译研究热潮。可以说这样说,受以上两篇经典性论文的影响,关联视角的应用研究也连续多年成为国内高校英语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热点选题。国内出版的代表性专著有《关联理论与翻译研究》(王建国,2009)、《言语交际的关联优选模式及其应用》(杨子,2011)、《关联理论本土化研究》(曾建松,2017)。关联理论自引介到国内,总体上说对其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991 年至 1999 年,

这个阶段主要是温和的引介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 1999 年至 2007 年，这个阶段是大红大紫的应用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 2007 年至今，这个阶段主要是冷却阶段，但笔者一直还在默默地坚持研究关联理论，也许笔者会成为最后的坚守者。

2007 年后，关联理论的研究热在国内逐渐变得冷却下来。笔者认为冷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原先研究关联理论的主力军改变了研究方向，转而研究其他。在此必须说明的是，改变研究方向、转而研究其他，这是无可厚非的。2003 年何自然教授首创了中国语用学理论——模因论，这应该是中国语用学界的一个伟大创举，自此国内语言学界终于有了自己独创的语言学理论。迄今为止，模因论研究在国内已经过了整整 15 年，已成气候。另外，当时国内语用学研究也开始呈现多点播种和开花的局面，这是国内语用学发展的一个必然和特点。由此，关联理论研究热变冷也是很自然的事了，在国内外语类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关联理论研究的论文明显减少了。随着关联理论研究热在国内变冷，对该理论的批评甚至否定之声却没有变得冷却，但颇有意思的是批评和否定关联理论之声大都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且大都是从宏观面提出的，而专门研究关联理论的学者倒是甚少批评。

应该说国内有些针对关联理论的批评是比较随意的，人云亦云现象严重，甚至还有声音不负责任地批评关联理论过时了。关联理论引介到国内的那个年代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年代，当时国内对来自国外的语言学理论都表现出极大的吸取和应用兴趣，被引进的西方语言学新理论可谓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一个普遍现象是某个语言学理论被引入后不久，就会迅疾在语言学界得以推广，但由此就必然会产生囫囵吞枣现象，也即国内学界往往对引进的某种理论还远未理解透彻时，就很快大面积推广和运用，关联理论也不例外。还有一种常见现象是，被引进的某种理论在热火了一段时间后，人们似乎就忍不住改变研究对象，转而去发现和挖掘另一种新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不管怎样，关联理论近十年还是被冷落了，误解还在继续，批评之声还在泛起。尽管很多针对关联理论的批评不客观也不正确，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是研究关联理论的，就对此视而不见。相反，笔者认为正因为许多批评不对，同时批评也一直在持续，所以在关联理论研究热变得冷却之

时,笔者也想冒昧地批评批评关联理论。

我最开始接触关联理论是看了沈家煊、张亚飞、何自然等人的论文,可以说他们是将我带入关联之门的引路人;而冉永平、赵彦春等人的论文使我对关联理论的认识得以升华。1997年我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得到了一本1986年版的《关联性》英文原著,并仔细阅读了两遍,2001年夏天在北京买到了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1995年修订版的《关联性》。2001年11月我参加了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关联理论专题讨论会,与会者都是全国研究关联理论的知名学者,我受益匪浅。至此,在阅读和学习《关联性》的基础上,我对当时国内外尤其是国内研究关联理论的现状和动态也比较了解,但总还是感到自己对关联理论在总体和细节两个方面无法精确把握。真正促使我下决心彻底搞懂关联理论的是在广外召开的第二届关联理论专题讨论会。一是看到自己跟与会者的巨大差距,二是何自然和赵彦春的一个对话对我触动很大。大会第一天上午散会后我碰巧跟在何自然和赵彦春身后走,赵彦春问何自然:“可不可以认为,处理努力越大,关联性越大?”何自然回答:“这肯定不对,应该是处理努力越小,关联性越大。”之后赵彦春没有再问。当时我想,就连他们这样的学术权威都对这类问题有争议,可见真正要搞懂关联理论不容易。从广外回到家中,我就做出了一个决定,要将《关联性》翻译成中文。当时我也做了些粗略的调查,了解到国内好像还未有人翻译过这本书,但我并没有马上去购买翻译版权,因为我也担心自己因能力所限而无法完成这个翻译工作。我不妨公开当时我的真实想法:如果我对自己的翻译感到满意,再去购买翻译版权也不迟;如果翻译不理想,那么对自己全面、深入理解关联理论也有好处,翻译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提高自己认识水平的过程。经过8个月没日没夜的工作,终于完成了全书的翻译,结果我对自己的翻译较满意,就给Deirdre Wilson发了一个电子邮件,打算购买翻译版权。但Wilson回复我说,这本书的翻译版权几年前就卖给香港的蒋严博士了,而且此刻他也差不多快完成翻译了。后来,2003年在广外召开的中国语用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我见到了Deirdre Wilson,将我的译文软盘作为纪念送给了她。虽然我的译文没能出版,但对我进一步提高对关联理论的认识还是帮助巨大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

经历当时艰苦的翻译,我根本不可能一直坚持研究关联理论到现在。通过翻译,一方面我加深了对关联理论的认识,但另一方面我也感到关联理论博大精深,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加以探究,甚至时至今日,关联理论中的有些问题还在困扰着我。

通过翻译《关联性》一书以及后来不断探究关联理论,我在加深理解关联理论的同时,也感到 Sperber 和 Wilson 在阐释关联理论时也的确出了些问题。确切地说,我所发现的这些问题都不属于宏观上的问题,都是微观上的问题,但恰恰是这些微观上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宏观上的误解、批评,甚至否定。换言之,国内外许多对关联理论的批评是源于误解关联理论,而作者对引起关联理论的重大误解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关联理论自问世后争议声和批评声就不断,且始终就没有一个合适的定论,往往是过后就不了了之。我觉得长此以往是不利于语用学发展的。于是,2011 年我就开始做关联理论的批评工作。毕竟自己翻译了《关联性》全书,全程感受和体验了该书作者的心思,也多少领悟到作者的真实意图,可以说做了一遍作者肚子里的“蛔虫”。我认为导致国内外语言学界对关联理论批评的主要原因是作者措辞不当或措辞前后不一致甚至矛盾,而引起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该书是两人合作完成的,而两人的母语又不一样,在“二合一”时就会出现在措辞上前后矛盾现象,由此就会给读者理解作者的信息意图造成巨大障碍。其次,就是读者的问题。Sperber 和 Wilson 在做论证时有个习惯:层层推进,由片面到全面,比如,在给“关联性”下定义时就是如此。作者总共给“关联性”下了三个定义,第一个是随意性定义,第二个是分类性定义,第三个是比较性定义。头两个定义是给第三个定义做铺垫的,但恰恰是第一个定义和第二个定义在国内学界被引用频次非常高,这表示读者在阅读原著时看到了头两个定义就止步不前了,由此就误以为这两个定义是作者给“关联性”下的正式定义。就笔者的体会而言,要想正确理解关联理论,就必须至少精读完全书,且一遍还远远不够。

从 2011 年到 2015 年的这段时间,我完成了对关联理论的批评与修正工作。我做的批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微观层面,这也是我的批评跟国内外大多数同类工作的一大区别。与其说我做的是批评工作,倒不如说 I 做的是

对关联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诠释工作，旨在帮助国内外广大读者正确理解关联理论。相比宏观视角的批评，微观层面的批评要艰难得多，要逐句逐句地“检查”，通篇前后仔细对比，找出在表征上和内容上不一致的地方等等，然后再分析微观上的缺陷是如何影响宏观认识的。如果研究仅是停留在对关联理论的批评层面上，则既不全面也不彻底。如果真的要做到将关联理论发扬光大，则必须实施修正工作。修正工作分为两类：一是包括在批评中的梳理，如指出前后表征和内容上的不一致现象；二是对有缺陷的重要定义进行再定义，如“关联性”定义、关联原则定义等。可以说，我的修正工作涉及了关联理论最核心内容的修正。就梳理而言，就包括内容重新排序，如“交际意图”和“信息意图”、“明示－推理”在原著中的排序会造成读者理解错乱；包括消除在重要概念的表征上前后不一现象，如在“最佳关联性”的诠释上就出现了前后矛盾现象，先是提出无论产生哪种语境效果，都会实现最佳关联性，但是在 1995 年修订版的“后记”中又提出了“正面的”(positive)语境效果才会实现最佳关联性。实际上纵观《关联性》全书，“后记”中的附加说明是错误的，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一种宏观批评之声，说关联理论是一种只能解释成功交际的理论，因此是一个局限性很大的理论。类似这样的现象在《关联性》一书中还有一些，均需要一一指出。就重要定义的修正而言，这必须在完成全书的所有梳理工作后才能进行。在此仅以“关联原则”定义一例进行说明。学界对“关联原则”的批评主要是说该原则过于笼统和模糊而不具有可操作性，这个批评还是中肯的。《关联性》全书总共四章，而“关联原则”的定义是在第三章的末尾处给出的，从前三章的论述来看，可以说 Sperber 和 Wilson 为最终给“关联原则”下定义做足了铺垫性的论证工作，但最终为什么却给出了一个的确过于简单的定义，有些令人费解。为此，我觉得有必要深入地研究研究，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纵观过去数十年中从国外引进的众多语言学理论，其实都存在一个彻底吸收、消化和发展的问题，换言之，也都存在批评与修正的必要，但如果研究仅是停留在批评和修正关联理论本身而不考虑如何更好地发展该理论的话，则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就势必要大打折扣。既然关联理论创建的初衷就是建立一个能够说明整个人类交际的一般性理论，那么它就自然能够充分

说明汉语交际,可以结合汉语交际来开展关联理论的汉语本土化研究。其实这既是关联理论本身发展的一个必然问题,也是被引进的其他众多西方语言学理论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我认为唯有解决这类问题,我们在国际语言学界才会有自己的话语权和在主流层面上占有一席之地。李洪儒强调,如何推动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是当代中国语言学工作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转引自曾建松,2017: 135)。对于本土化,石定栩理解为,“在国外理论的思维方式、论证方式指导下,寻找汉语材料,用大家信服的方法去解决汉语问题”(转引自曾建松,2017:138)。在此我冒昧地调整一下石定栩定义中的措辞,将“汉语材料”具体化为“古汉语和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汉语材料”,原因有二:一是古汉语是汉语的典型代表,中国开创性文化都是用古汉语表征的;二是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汉语材料才应该是关联理论本土化研究中的研究对象,而那些可以表达人类交际共性的汉语则不应该包括在内,如此研究才能体现出本土化。由此,关联理论汉语适用性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都变得明确、清晰了,研究起来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否则就会让人以为只要运用该理论来说明一切汉语现象就是关联理论汉语本土化研究。运用关联理论来研究平日一般的汉语言语交际就应该属于关联理论应用研究范畴,而不应该划归为关联理论汉语本土化研究范畴。

基于以上设想,我近几年开始尝试对关联理论做汉语本土化研究,用关联理论去分析和诠释《道德经》的英译。如此研究意义有二:一是之前甚少有人从关联视角探究中国古籍英译,因此这将有助于实现《道德经》英译研究理论体系化,大大提高研究效度,为《道德经》的英译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研究视域。二是扩大了关联理论的研究范围,做到了中西兼容、中西并举,这是迈向和实现汉语本土化的一个实质性举措。我的研究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面上,二是点上。所谓面,指的是一次用关联理论的多个重要概念来诠释《道德经》英译,如最佳关联性、明示 - 推理、互明、语境效果、关联保证、关联期待、动态语境观等等。所谓点,指的是一次用关联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去深度剖析《道德经》英译,如或用互明概念或用最佳关联性概念等等,将这个单一的概念进一步细化,再用细化成分去分析《道德经》英译。这是我的研究思路,而事实上我也是严格按照这个思路来开展研究的,如在面

上工作有《〈道德经〉英译的关联性研究》一文,在该文中我从最佳关联性、演绎推理和互明三个层面分析和诠释了 Arthur Waley《道德经》英译本中的缺陷问题。在点上工作有《〈道德经〉英译的互明性诠释》一文,该文基于被细化的几个互明支点——初始语境、初始语境扩展、不同的语境效果,诠释了 Arthur Waley 的《道德经》英译本中若干重大缺陷。从这两篇论文的完成情况来看,面和点的研究思路完全是可行和有效的,在主观上对《道德经》英译中诸多问题进行了较有说服力的剖析和解释,给《道德经》英译研究注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在客观上也进一步印证了关联理论作为人类交际一般性理论的有效性和巨大解释力。在此的“客观”实乃“主观”或有意为之,因为拓展《道德经》英译思路在此不过是研究手段,而研究目的则在于对关联理论做汉语适用性研究。其实对关联理论做汉语适用性研究就必然会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理论本身,如关联理论提出人类语言交际中的推理是“演绎推理”,但由于受到古汉语的限制,译者在解读和英译《道德经》时所做的演绎推理就会含有意象分析、映射分析和经验分析,那么演绎推理就会呈现出整体性、主观性和模糊性的特点,这是由古汉语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由此英译《道德经》时的推理就会是“复合型演绎推理”。当然,这里同时还存在一个视角问题,如果从《道德经》英译的研究视角看,则结论又不一样。

上文说到用关联理论去研究能够承载中华文化的汉语材料,这也是关联理论汉语本土化研究。国内已经有人在这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曾建松博士的博士论文《关联理论本土化研究》(2016)就这个专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她的博士论文被评为 2016 年黑龙江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且获得湖南科技大学专著出版资金资助,2017 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关联理论本土化研究》一书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本这方面的专著,是关联理论汉语本土化研究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书作者将关联理论植入现代汉语中,对所选莫言的长篇小说《蛙》进行逐句逐段地分析,发现相关语言事实,从认知环境、明示 - 推理交际和关联原则三个方面探讨了关联理论的汉语本土化问题,由此建构了汉语交际的语境整体模式、复合型演绎推理模式以及扩展式关联原则,从而有效地验证、修正和发展了关联理论。必须指出的是,该书不但不是关联理论汉语适

用性研究的终结标志,相反,应该是开启全面、深入研究关联理论汉语本土化的一个激活点和加速器,从而掀起关联理论研究的一个升华高潮,这就是“洋为中用”中的学以致用。

回顾过去自己 20 多年关联理论研究历程,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即关联理论研究过程其实是一个起起伏伏的过程,每每看似对关联理论研究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总会又出现关联理论新的研究热点,如现阶段悄然兴起的关联理论汉语本土化研究就是如此。其实,这并不是关联理论的个例现象,而是现阶段国内整个语言学界的一个普遍现象。过去几十年中从西方引进了不少语言学理论,时过几十年后的今天,大家对如何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些理论都进行了切合实际的思考,形成了一个共识:汉语本土化研究。许国璋先生说,对国外的语言理论要加以分析、比较、判断,更重要的是“结合汉语的研究加以验证,写出结合中国实际的论著”。这就要求国外的语言理论必须经过本土语言(汉语)的验证,这也是语言学理论本土化研究的诉求。近年来,语言学理论“本土化”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王寅与王天翼提出国外前沿理论更应与我国的实情和理论相结合,走本土化的合璧式创新之路;李洪儒强调,如何推动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是当代中国语言学工作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黄国文近十年致力于功能语言学本土化研究“提出要对国外理论体系进行建构、修正、发展和完善”;林华东认识到“化外来理论为已有,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新理论”成为当前和今后急需推进的工作。(转引自曾建松,2017:135)可喜的是,在众多引进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中,关联理论汉语本土化研究已经领先一步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在关联理论汉语本土化研究距离被国内外学界广泛认可和接受还相差甚远,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实事求是地说,西方语言学理论汉语本土化研究应该是这些西方理论在中国研究的收官工作,之后我们必然会在“中西合璧”的基础上创出中国自己的语言学理论。

以上所言,既是我们对自己过去多年来研究关联理论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关联理论研究的展望。

参考文献

- [1] Clark B. Relevance Theo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2]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3] Wilson D, Sperber D. Meaning and Releva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4] 陈新仁. 试论语用解释的全释条件 [J]. 现代外语, 2001(4):378 - 389.
- [5] 陈新仁. 衔接的语用认知解读 [J]. 外语学刊, 2003(4):50 - 56.
- [6] 陈新仁. 英语首词重复的语用认知阐释 [J]. 外语研究, 2004(1):45 - 50.
- [7] 陈新仁. 论语用平衡 [J]. 外语学刊, 2004(6):42 - 47.
- [8] 何刚. 提问的相关性解释 [J]. 外语学刊, 1996(1):13 - 18.
- [9] 何自然. Grice 语用学说与关联理论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4):23 - 27.
- [10] 何自然. 推理和关联 [J]. 外语教学, 1997(4):1 - 10.
- [11] 何自然, 冉永平. 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 [J]. 现代外语, 1998(3):92 - 107.
- [12] 何自然, 冉永平. 话语联系语的语用制约性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3):1 - 8.
- [13] 何自然, 吴亚欣. 关联理论是一种“因错而‘对’”的理论吗? ——关联理论是非谈 [J]. 现代外语, 2004(1):89 - 96.
- [14] 何兆熊. 语境的动态研究 [J]. 外国语, 1997(6):16 - 22.
- [15] 胡旭辉. 关联理论: 反思、批评及解决方案 [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7.
- [16] 胡旭辉. 关联理论与乔姆斯基语言学共性初探及反思 [J]. 外语学刊, 2008(2):95 - 101.
- [17] 胡旭辉, 徐新仁. 批评语篇分析的关联视角 [J]. 外语学刊, 2014(1):

35 - 41.

- [18] 姜望琪. 再评关联理论——从“后叙”看 Sperber 和 Wilson 对关联理论的修改[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5): 301 - 308.
- [19] 蒋严. 语用推理与“都”的句法/语义特征[J]. 现代外语, 1998(1): 11 - 23.
- [20] 蒋严. 论语用推理的逻辑属性——形式语用学初探[J]. 外国语, 2002(3): 18 - 29.
- [21] 蒋严. 关联理论的认知修辞学说(上) [J]. 修辞学习, 2008a(3): 1 - 9.
- [22] 蒋严. 关联理论的认知修辞学说(下) [J]. 修辞学习, 2008b(4): 14 - 21.
- [23] 刘家荣. 话语相关与认知语境[J]. 外国语, 1997(3): 20 - 23.
- [24] 刘绍忠. 关联理论的交际观[J]. 现代外语, 1997(2): 13 - 19.
- [25] 刘绍忠. 认知环境、相互明白与语际语言交际[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8(1): 1 - 7, 18.
- [26] 孟建钢. 关于翻译原则二重性的最佳关联性解释[J]. 中国翻译, 2002(5): 27 - 31.
- [27] 孟建钢. 试析关联理论对话语理解规则的解释[J]. 外语学刊, 2004(2): 21 - 27.
- [28] 孟建钢, 唐清. 对语言符号象似性的关联认知性阐释[J]. 外国语言文学, 2008(3): 165 - 170.
- [29] 孟建钢. 对关联理论缺陷的微观性批评[J]. 外语学刊, 2012(6): 83 - 88.
- [30] 孟建钢. 试析关联理论“反说”正说现象[J]. 外语学刊, 2015(6): 20 - 24.
- [31] 孟建钢. 《道德经》英译的关联性研究[J]. 外语学刊, 2018(4): 80 - 86.
- [32] 苗兴伟. 关联理论与认知语境[J]. 外语学刊, 1997(4): 7 - 11.
- [33] 苗兴伟. 关联理论对语篇连贯性的解释力[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3): 9 - 14.
- [34] 莫爱屏. 交传与明示 - 推理交际——口译的理性思考[J]. 语言与翻译,

2003(2):43-47.

- [35]莫爱屏. 推理照应的语义研究[J]. 外语研究, 2004a(3):10-14.
- [36]莫爱屏. 话语标记语的关联认知研究[J]. 语言与翻译, 2004b(3):3-8.
- [37]莫爱屏. 话语中推理照应关系的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c(9):9-12, 43.
- [38]莫爱屏. 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路径[J]. 中国外语, 2011(3):88-94.
- [39]曲卫国. 也评“关联理论”[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2):9-13.
- [40]冉永平. 话语分析的语用学基础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7(1):16-19.
- [41]冉永平. 语用过程中的认知语境及其语用制约[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8):28-31.
- [42]冉永平. 关联理论研究的又一新成果——《语用照应与关联》评介[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6):473-476.
- [43]冉永平. 关联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第二届关联理论专题讨论会综述[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2a(1):12-17.
- [44]冉永平. 论关联理论的社会维度[J]. 外国语, 2002b(3):30-36.
- [45]冉永平. 言语交际的顺应—关联性分析[J]. 外语学刊, 2004(2):28-33.
- [46]冉永平. 当代语用学的发展趋势[J]. 现代外语, 2005(4):403-411.
- [47]冉永平. 翻译中的信息空缺、语境补缺及语用充实[J]. 外国语, 2006(6):58-65.
- [48]沈家煊. 讯递和认知的相关性[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8(3):62-65.
- [49]熊学亮. 单向语境推导初探(下)[J]. 现代外语, 1996(3):16-20.
- [50]熊学亮. 从指代研究看新格赖斯语用学的实用性[J]. 外国语, 1997(3):13-19.
- [51]熊学亮. 认知语境的语用可及程度分析[J]. 外国语, 1999(6):17-23.
- [52]熊学亮. 认知相关、交际相关和逻辑相关[J]. 现代外语, 2000(1):13-23.
- [53]熊学亮. 对关联理论中逻辑的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10):